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湖南工运史

研究资料

第四辑

湖南省总工会调查研究室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关于征集湖南工运史料的几点意见 张生力 (1)

回忆录:

回忆湖南早期工人运动(上) 陈新宪 (8)

专题材料:

湖南劳工会与黄爱、庞人铨 湛小岑 (15)

年终索薪与黄庞殉难 马盛乾 (20)

讨论与研究:

黄爱、庞人铨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谷 茨 (23)

试论长沙“灰日暴动” 唐振南 (32)

人物传:

唤起工农千百万

——记杨昭植烈士革命事迹 宋伟明 (35)

陈弗章传略 苏去强 (41)

简讯二则:

关于征集湖南工运史料的几点意见

张 生 力

编者按：张生力同志在全省工运史干部学习班上的这篇讲话，对征集工运史料的范围，以及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本刊加以印发，以作为省总下发的《关于搜集整理新民主主义时期全省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的工作规划》的补充。请各级工会参照执行。

一、湖南工运史的分期和上限问题

湖南工运史是湖南党史的重要组成部份。工运史的分期应同党史一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党的创立和“一战”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二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三战”时期。这样的分期，就是把湖南工运史写成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运史。

但是湖南的工人运动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

工人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而产生和发展的。湖南的现代产业工人产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时期，也就是戊戌变法和湖南维新运动时期。1895年，长沙设立了官商合办的“湘善记和丰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内有女工六、七百人，男工百余人。1896年，湖南设立了水口山官矿局和官督商办的宝善成制造公司。1897年，湖南设立了锡矿山官矿分局和益阳板溪锡矿，“还开办了湘鄂印刷公司。1898年，开办了萍乡煤矿、平江矿务公司、化学制造公司。

湖南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从这一时期算起。不过它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新生的自在的阶级，只是从1905年起才由自在阶级转到自为阶级。1905年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同盟会，开始统一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年。从这一年到1919年，安源煤矿工人共罢工七次；湘潭数百锡箔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曾于1905年联合罢工几天；锡矿山工人反对袁世凯称帝，曾于1916年罢工，并夺取矿警枪支宣布工厂独立；水口山工人为了争取年终红奖，曾于1917年罢工并暴动；长沙泥木工人、人力车工人也因工价和车租问题，于1918年进行了几次罢工。这些罢工斗争都发生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主要是搞经济斗争，但也有政治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是自发的，但应属于革命运动，应列入湖南工运史，作为上限来写。

1926年12月“湖南工人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传纲要”中说：“湖南工人运动发生于赵氏（指赵恒惕）制宪的时候。这时候，一面高唱‘劳工神圣’，一面也因赵氏制宪而使工人发生政治上的要求。这时的工人运动，一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一是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最初的组织便是劳工会，主持的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

员”。根据这个宣传纲要，认为湖南工人运动的上限是从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后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劳工会算起。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的意见是把湖南工人阶级的产生和自发斗争作为一个时期来写，也就是把湖南工运史的上限上溯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

二、湖南工运史的连续性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对“马日”事变后湖南工运的看法问题。有的同志把工运史看作罢工史，认为湖南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二战”时期，很少罢工活动，工人运动处于停顿阶段。有的认为“二战”时期湖南白区的工会都是反动的黄色工会，没有什么可写的，怕犯右倾错误。有的把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等同起来，认为这一时期湖南白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也就没有革命的工人运动。有的因为这一时期的工运史料很少，也很难征集到手，也不好加以评说，于是就采取跳越的办法，一步就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看法和作法，影响了湖南工运史的连续性。如何征集“二战”时期的湖南工运史，我提出两条线索。

一是向“四边”找工运史料。“二战”时期湖南工运的主要特点，是向“四边”发展，同武装斗争相结合，为建设苏区服务。这个时期的湘鄂西边区有44个县，湖南占21个县。湘鄂川黔边区有31个县，湖南占16个县。湘鄂赣边区有20个县，平江、浏阳是这个苏区的主要根据地。井冈山周围的湘赣边区，是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工运的许多骨干分子转移到“四边”去了。湖南省总工会的两位主席宋新怀同志和袁学之同志，都是安源煤矿工人。宋新怀同志是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袁学之同志是红军打长沙时参加红军的。安源煤矿出了五个将军，广州军区原政委晏福生同志就是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刘先胜同志，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辛元林同志，铁道兵副司令员罗华生同志，都是安源煤矿出身的工人。中央苏区红军中的第一支工兵部队，就是由安源工人组成的。湖南的四个边区建立苏维埃政府时，还在部分县中建立了苏区工会。我认为苏区工会在湖南工运史上处于特殊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不是可有可无。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史学工作者，已写出了“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和江西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征集湘赣苏区史料。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史学工作者已经制订了征集湘鄂川黔边区史的计划，正在分工进行中。属于这四个边区的地县工会，可向这方面发掘工运史料。

二是征集黄色工会的典型史实作反面教材。1931年底，湖南白区的党组织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全部丧失，但仍有许多工会存在，长沙就有七十多个职业工会。有些工会变成了国民党甲派（钻子派、C·C派）或乙派（皮刀派、何键派）的工具，有些工会还被行会、帮会或工贼、老板所控制。1934年2月，全省公路技工为了争取星期例假发给工资而罢工；1937年6月，湖南第一纺织厂为了要求恢复“工厂法”而罢工。这两次较大的罢工斗争都因被工贼出卖而失败了。我们也可以征集黄色工会和叛徒工贼的典型事例，从反面来写这个时期的湖南工运，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三、关于知识分子和职员在湖南工会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议中规定：“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工头等与工人阶级相反的分子”。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工程师、监工等类职员，不得加入工会，包头、工头、领班等不得加入工会”。

当时工会运动中的这种阶级路线和组织路线，表明工程师和职员等脑力劳动者不被算作工人阶级，而且“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的任何联系。

据袁学之同志回忆，1922年9月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在安源的权力很大，威信很高，以致有些人说安源是小莫斯科。当时许多职员和工程师要求加入俱乐部，俱乐部说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不准他们加入。于是全矿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组织了一个游艺部。参加游艺部的职员组织球赛时，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就去挑战，弄得那些职员搞不成，以后还把游艺部整垮了。

我们征集湖南工运史料时，不能避开上述决议和作法，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是“左”的就写成“左”的，是右的就写成右的。

四、关于手工业工人在湖南工人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据1926年12月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调查统计，湖南共已建立十二个产业工会，合计会员58,309人，其中：粤汉铁路总工会1,200人，株萍铁路总工会1,200人，汽车路总工会1,400人，海员工会1,710人，邮务总工会163人，锡矿山总工会25,125人，安源煤矿总工会10,500人，水口山矿工会6,705人，第一纱厂工会2,950人，炭塘子矿工会2,862人，常宁北窿矿工会2,260人。

又据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统计，1926年12月，全省已建立县总工会30个，合计会员221,599人，县总工会筹备处13个，无会员统计数。当时全省75县中，已有44县建立了县总工会或筹备处。这些县工会的二十二万一千多会员，90%以上是手工业工人。又据49县的农民协会会员统计数，已加入农会的手工业工人合计80,998人。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全省各县手工业工人总计三十万人以上。长沙是湖南手工业的中心，十四个行业工会都是手工业工人，共有会员二万多人。1922年9月到1923年4月，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全省各产业和行业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掀起了湘区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全省参加罢工有十三个产业和行业工会，合计三万五千多人，其中长沙参加罢工的有泥木、织造、缝纫、理发、笔业、印刷、人力车等七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一万二千多人。从湖南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来看，手工业工人队伍大（在1926年约为产业工人的五倍），参加工

人运动早（湖南早期的罢工斗争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分布广（全省各县以及各行各业都有手工业工人），资格老（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现在各地博物馆中陈列的许多产品，大都是古老的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因此，手工业工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运史中，应占有重要的一页。特别是当时各县的工会运动和四大苏区的工会运动，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厂矿机械等现代产业，那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

五、湖南工运的方针任务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提出了工人运动的方针任务。这是编写工运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决议案中有这样一案：

“中国在相当期间内的劳动运动，宜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当时湖南工团联合会还没有成立，（它是1922年11月成立的），出席全国一次劳大代表是劳工会代表张理全。这个提案虽然是武昌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提出的，但也反映了中国工人运动初期的方针任务。湖南劳工会拥有十多个工会约四、五千会员，从1920年11月成立之日起到1922年1月被赵恒惕查封时止，它在湖南工运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劳工会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毛主席在1921年11月劳工会成立周年纪念时，写了一篇题为“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后来由毛主席担任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的湖南工团联合会，就是贯彻执行这个工运方针任务的。

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作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和工会运动的议决案，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

“（一）……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

“（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

“（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

“（四）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为劳动立法运动……”

“（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

“（八）工会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到同等的工钱……”

“（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

“（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络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

“（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

“（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大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党的“二大”通过的“附加议决案”中说，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

“1.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2.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必须进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织成一个工会”。

“3.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

以上就是1922年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的方针任务的议决案。

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一、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

“（一）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

“（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的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

“三、工人阶级目前的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这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得到的”。

“在这长期争斗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

关于经济斗争的决议案中说：“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二）八小时制的规定……（三）反对一切虐待……（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五）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六）取消包工制……”

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作出了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的决议案。

决议案说：“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在求经济之改善及相当之自由，而其责任则在促成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死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如何团结全国工人一致奋斗？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尽什么责任？是这次劳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

决议案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阶级固应立在最前线，然亦应与各阶级革命民众（特别是学生、小商人）建立联合战线……”

决议案说：“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有好些种，有时还要依照当地的情形而定，目的在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工人阶级第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二种形式就是工会……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馆、饭堂、寄宿舍等等合法的组织团结工人……”

决议案说：“工人群众中战斗力最强，首推大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码头、市政的产业工人。凡工人群众的解放运动，必须以此种产业工人为中心，再联络和组织各小工厂与广大的手工业工人与商店雇员共同奋斗，工人运动才能一致而有力……因此，大产业工人必须赞助各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和组织，而各种职业工人则必须跟着产业工人而为全民族和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决议案说：“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而产业工人却在大城市占重要地位……因此，工人与农民之关系，不但是同盟而已，而且工人群众随时都提携着农民一致奋斗，这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不要忘记的”。

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会制定了“对工人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十七条，作为“切合现时需要之工人政纲”，交给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贯彻执行。这十七条政纲是：“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制定劳工保护法”。“大产业收归政府公办”。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严禁包头制”。“取消一切直接或间接向工人征收之税款（如码头派差、人力车月捐等）”。“改良工厂卫生，实行劳动保险……”。“改良学徒及艺徒制度……”。以及保护童工、同工同酬、救济失业工人等主张。

以上只是建党以后到大革命时期湖南工运的方针任务。我们征集、研究、编写这个时期的湖南工运史，就要调查研究湖南各级工会是如何贯彻执行这些方针任务的。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工运的方针任务就随党的路线政策而改变了。各个时期的工人运动是有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的，史料是比较复杂和丰富的，要写好湖南工运史，关键在于如何去发掘这些史料。

六、湖南工运人物问题

在中国工运史上，湖南出了很多有名的工运人物和领袖。省总工会在“关于搜集整理新民主主义时期全省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的工作规划”中，提了一个名单，按地区列名的有17人，按产业列名的有16人，合计33人，可能还遗漏了一些人。据易礼容老人回忆，1922年长沙的工人运动，石印工会是声色有色的。有一位姓朱的女同志，那时只有十六、七岁，是石印工人中的英雄。敌人对她残酷迫害，她不屈服，后来英勇牺牲了。她的两个哥哥都是石印工会很得力的骨干，石印工会的工作就是他们推动的。这两个哥哥后来也牺牲了，一家三个烈士。关于这三个烈士的情况，北京市政协文史馆的陈树华同志比较了解。

当时的长沙铅印工会在罢工斗争中也是有声有色的。这个工会的领导人是谭影竹，曾任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他反对过毛主席，也反对过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同志。“马日”事变后，他投降了湖南军阀何键，解放后被镇压了。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是湖南党首先抓的一个重点。郭亮同志于1922年暑期从省立一师毕业，这年九月，毛主席派他去新河铁路办劳工学校。郭亮去之前，还有余盖（余千山）在粤汉铁路做过很多事，主要是创办了劳工学校。还有长沙泥木工会的任树德同志，也在粤汉铁路搞过工人运动。我们写粤汉铁路早期工运史，不能只写郭亮同志，还要提到他的先行人。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水口山派谢怀德到安源取经，当时李立三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他同中共湘区委员会商量后，派易礼容、蒋先云去，帮助水口山建立工人俱乐部。易礼容老人回忆说：“我和蒋先云一道去水口山，但是所有的文章没有我的名字。事实上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我是第一个负责的人，蒋先云还是第二个负责的人”。

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老同志早年对湘区工运的巨大贡献，应该摆在征集的第一位。李锐同志写了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突出的写了毛主席领导湘区工运的历史。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领导安源工运的历史，出版了一些回忆录。我们征集湖南工运史料时，还应进一步发掘这方面的史料。

征集湖南工运人物史料时，还可能遇到一些冤假错案。王首道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1930年肃反扩大化时，杀A、B团，杀社会民主党（指福建）杀改组派（指湘鄂西），杀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是极左的搞法，是一场灾难，应该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牵涉到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我们征集这些苏区的工运人物史料，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工会干部无力解决这些历史奇冤，只能建议当地党委解决。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单是存在于王明路线时期的苏区，其他地区也很多。我们可下去抓几个典型案例，提供县委参考。

关于湖南工运人物，除了党史人物、民主爱国人士以外，还要征集少数典型的反面人物。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提出了铲除工贼的名单和材料，报请湖南省政府惩办，其中有锡矿工贼刘铁逊、杨执中等人，水口山工贼戴子和、朱科益等人，电气总工会工贼黄钊白，岳阳工贼涂醉吟、郴县工贼李言焕。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邓寿荃在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中说：“当政府刚到长沙时，湖南总工会虽已成立，但是欺骗工人的劳工会尚存在，后来政府毫不姑息的将其封闭，谌小岑是工人中的工贼，到处破坏工会组织，政府便马上通缉”。这是在大会中由国民党左派公开点名的工贼。关于工贼的名单不一定要很多，但其史料愈典型具体，愈可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回忆湖南早期工人运动

(上)

陈 新 宪

一、湖南近代工业的兴起和早期工人运动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企业中，在官僚资本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企业中做工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货倾销和直接经营企业，使我国手工业日趋崩溃，也使我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就湖南来说，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湖南巡抚骆秉章派黄冕在长沙城内府城皇庙设火药局，制造铁炮、火药和铅弹，是当时湖南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召集一些地方士绅创办洋火局，又叫和丰火柴公司，除在长沙北门外设总厂外，又在安化、益阳、桂阳等地设厂自造，采用简陋机器设备，仍以手工操作为主，每日生产火柴二十余箱，省厂工人达八百人，其中六、七百人是女工。火药局和洋火局都发生过重大事故，一八五九年火药局发生爆炸事故，一九〇六年长沙发生大水灾，洋火局全部厂房被淹，工人们生命财产损失很大。

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创办近代工矿产业和交通事业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于一八九五年十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到任至一八九八年八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离任），下车伊始即奏请设矿务总局，委湖南早期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朱昌琳为总办（朱是湖南商业、金融业和工矿业的巨子），矿务总局成立后，即在湘阴成立矿砂转运处，随又派廖树衡至常宁水口山主持开矿事宜。水口山铅锌矿相传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明万历年间），当地人就进行开采了，那时主要是提银和炼磺，因为技术落后和官府查禁，时开时停，廖树衡去后采用新的“明窿法”，促进了矿业生产的发展。平江黄金洞金矿，清初被当地人开采过，后被官府封禁。矿务局成立后收买设立金矿局，用土法开采提炼，平均每月开采矿砂约二百吨，可提炼纯金百余两。金矿在湖南最早较大的是会同漠滨月产五、六百两，沅水流域河床产砂金，沅江的柳林汉，洞中弯，过去有“金带”之称，邵阳、隆回在宋朝就有年贡十二两的记载。新化锡矿山的锡矿于一八九七年设官矿分局，矿质为硫化锡，间有氧化锡，矿质纯净，矿藏丰富，与水口山的铅锌矿均闻名世界。锡

矿山工人在清朝时候只有三万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远东，矿业得以大大发展，工人增至十万。益阳的板溪锑矿，矿产虽丰，但矿质较差。陈宝箴在该地设立中路久通公司，开采若干年，成绩不大。一八九六年，陈宝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之间的电线，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一八九六年十月，清政府决定修筑粤汉铁路，湘维新派坚持要铁路经过湖南，反对原议道经江西，清政府同意后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一九〇〇年又签订借款续约，借款增至四千万美元，但铁路沿途开矿权利则拱手让给美国。一八九八年三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张之洞、盛宣怀奏准修筑萍萍铁路（即后来的株萍铁路），一九〇〇年开工，一九〇六年一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全部完成。自此，安源的煤可用火车运到株洲，再转水路到汉阳。一八九七年春，湖南熊希龄、蒋德钧等报请筹办湖南内河轮船，张之洞批准设置鄂湘善后航船局，一八九八年四月，湖南轮船开始于湘潭、长沙、常德、岳阳、沙市、汉口六埠航行。这对当时湖南矿业的开采，煤、铁的运输，地方生产的发展及商品的交流都是需要的。自制轮船对保障经济权利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一八九六年，地方绅士王先谦、黄自元等集股创机器制造公司，叫宝善成公司，原由官督商办，初设时购买了各种机器，有小锅炉马力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原拟搞重工业性质的机器制造，后改搞轻工业性质的纺织、榨油、舂米、洋烛……，都无什么成就，只有一八九七年创设的小规模发电厂，开始在长沙城用电灯。

《南京条约》以后，实行五口通商，湖南的岳阳、常德、长沙也为向帝国主义借款而通商，当时从小西门到麻园岭一带都是外国领事馆，水陆洲也有领事馆，外国军舰长驻湘江，我们的海关负责人也都是外国人，帝国主义直接办的企业，象在长沙小西门外过去的三井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亚细亚美孚煤油公司中都有不少中国工人。

以上所述，说明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说明湖南民族资产阶级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的，也说明湖南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伴随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湖南经营企业而来。

我省第一代工人阶级一出世就受到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湖南的产业发展虽然比江浙、广东、福建要迟一些，但劳动者的斗争并不后人，现就湖南年幼的工人阶级举行规模较大而又有影响的自发斗争介绍如下：

1. 湘潭锡箔工人的罢工

湘潭的锡箔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明代江西向湖南移民时，江西人民就将锡箔制作方法带来湖南湘潭，后来结成所谓“赣帮”（江西帮），制作锡箔就是他们的专业，按工序工匠分为六门，有表金、捶金等名目，必经合六门手艺，始能成锡箔一张，这种生产特点本身使工人联成一起，团结无间。一九〇五年五月间，因捶工要求恢复原工资，爆发全行业工人的联合大罢工。原来捶工工资系按件计算，96张纸算一刀，每刀约钱八十三文，后店主借口生意萧条，每刀减去十文，仅有七十三文。一九〇五年春夏间，生意兴旺，于是各捶工要求仍加十文，以符合原数工资。但店主执意不肯，引起工人忿怒，锡箔工人约集同帮数百人一齐停工，并集合到县衙门提禀告，衙门为之充塞，罢工持续了五、六天，不仅影响了江西帮所在的湘潭一些地方，而且影响到了其它的县，然终被官方当局强力所镇压，而加复工资，仍未实现。这种只是依靠托亲带故的封建关系所进行

的单纯经济斗争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提不出什么政治斗争的口号、也提不出进一步行动的方针，不能动员其它工人的广泛支持，因而不能达到恢复工资的目的，但这次罢工，却使工人开始认识到官府是保护店主有钱人的，虽然得到同帮口的全力支持，力量犹过于单薄。

2. 长沙的抢米风潮

一九一〇年四月中旬，长沙爆发“抢米”大风潮，持续了几天，推动了湖南各地的反压迫反饥饿的斗争，长沙的抢米风潮常被人忽视为平民的自发斗争，但实际上抢米风潮又是工人搞起来的，不但抢米风潮的发生是因工人而起，而且领导这次抢米风潮的也是工人。事情的发生是由于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者在青黄不接时运米出境，地主豪绅则乘机屯积居奇，奸商则无止境地提高米价（一日数价），致使长沙市人心惶惶。南门外卖水工人黄贵芬几次筹钱买不到米而全家投水自杀。接着碧湘街又发生奸商卡价，引起群众愤怒捣毁碓坊，进一步要求官府平粜，结果官府反派消防队来捉拿带头人，木匠刘永福被捕，送往巡警公所收押，激起广大群众义愤。泥木工和铁路小工联络附近贫民数千人，包围长沙、善化两县知县，痛打巡警道赖承裕，由于巡抚岑春萱一再派队弹压，群众拥入巡抚衙门，毁照壁、砍桅杆、捣石狮，岑调常备军开枪射击，群众更愤怒，一夜之中将城内外堆栈及各碓坊之米，扫数抢空，警兵岗哨，捣毁尽净，全城于十四日开始罢市。在官绅蓄谋进一步镇压的情况下，起事群众采取了更坚决的行动，“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便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下令开枪扫射，死群众二十余人。这种流血恐怖不但没有吓退群众，反而如火上加油，其势愈来愈盛。接着群众便将帝国主义在长所设之教堂、领事馆、英商太古洋行、怡和趸船、堆栈、美孚油公司、德商瑞记、日商三井、东信洋行、以及大清银行、长沙税关、医院等捣毁，一些学校也被波及了。十五日以后，官方又从外县、外省调来军警镇压，英、美、日、法、德各帝国主义相率从汉口、上海，甚至福建调军舰十余只来湘镇压。

在中外反动军队联合镇压下，起事群众被杀不知其数，被捕数百人，起事领导人刘永福亦被杀害。因这次事情震动中外，清政府不得不将巡抚和藩台革职，按察使、知府、知县均降职调用，劣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均受到惩处。这使后来接任的巡抚不得不谋善后，拨款平粜发售，以缓和民愤。但湖南各地在此时亦掀起暴动：

宁乡：四月十四日晚，群众集聚三、四百人捣毁南门外和北门外的教堂，接着放火焚毁巡警局。

益阳：四月十七日，聚众焚毁米店，将外运之米悉数平粜，捣毁官钱局。

湘潭、浏阳、醴陵各县及长沙近郊，饥民四处抢米，湘阴、岳阳等县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平江、常德、宝庆、衡阳各地亦有类似情况，但都与长沙一样被官府镇压下去。这次抢米风潮，声势之大，影响传播之速，对辛亥革命及湖南的光复，都有某种程度的作用和影响。

这次风潮，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自发性，也由于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指挥，历史的条件决定要归于失败，但却使人民群众认清了帝国主义与官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面目。这次抢米风潮，虽有帮会势力在内鼓动，但没有与革命势力（同盟会）联合，致归失败。

3. 新邵、涟源边境龙山矿区工人与附近农民联合举行大暴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各帝国主义无暇顾及远东，我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特别是矿业的黄金时代，水口山、锡矿山是如此，其他如龙山锑矿亦如此。这时资产阶级发了横财，对工人更进行残酷剥削，对附近农民更是任意践踏，暴动的直接起因是矿山矿警枪杀了太芝庙白义塆的检砂农民和污辱检砂妇女而起，激起矿工和附近两县农民的愤怒，新邵方面有一万多农民请了数十个把师带队，分三路冲上矿山，涟源农民和矿山工人共同接应，结果放火烧了龙山矿区各公司，工人协助从窑洞内将躲藏的经理李某拖出投入火里烧死，将矿山财物夺取一空，对民愤较大的把头亦予以殴打惩治。矿警武器除逃带而走的以外，亦多缴获。因为是在边境山区，官府鞭长莫及，使暴动群众各自胜利凯旋。后来矿山主勾结军阀张辉赞派兵一再反攻抓人，致太芝庙山底下有一锯工李某和一起事者陈某被反动军队斩首示众，还烧了许多间民房。接着又引起了第二次暴动，枪杀了张辉赞的外孙和十几名士卒，旋因谭、赵战争而不了了之。这次暴动主要是哥老会和贺金声余众搞起来的，仅发泄了破坏性、出出气就结束了。

从当时许多斗争事例中举出上述三个历史事例，主要想说明我省工人阶级诞生后自发斗争是怎么搞起来的。在这里提出工人队伍中帮口、帮会、行会对工人的影响源远流而流长。帮口、帮会、行会都是封建性的组织，这三者又各有其独立的组织形式，帮口是按地区同乡结成的，如大而言之赣帮、粤帮、闽帮等，小而言之，衡州帮、永州帮、醴陵帮、新化帮等，彼此不能相混；帮会一般都是秘密组织的，在沿江、沿河、沿铁道一线均各开辟码头、尊师开山堂、发海底、插标签，吸收徒众，可以凭证跑天下；行会则以同行同业为主，尊敬一个祖师爷，如：木匠敬鲁班，缝纫敬轩辕，理发敬吕祖，船工敬肖天任（英佑候），泥木工人有鲁班殿，缝纫有轩辕宫，理发有吕祖庙，船工有水府庙（或龙神、河神庙）。这些封建性的组织常常被行业主、店主、把头、监工利用它来剥削、压制工人；工人也常借此求得一个吃饭的地方，但又不得不受种种行规所束缚。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封建组织势力在解放前各个时期对我们工人运动的影响。我们在准备组织力量进攻的时候要利用它这种组织内的工人的革命斗争性，在胜利发展的时候要防止它的无纪律的破坏性，在退却的时候还要利用它来保护革命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这种封建性组织，在党成立之前，常参与工人的自发斗争并在中起着团结组织乃至指挥的作用，如以上所述的新邵龙山矿区工农暴动就是以哥老会为首的。但这种组织的领导人往往被统治者和资本家所收买利用来破坏工人的团结斗争。特别是这种组织势力在五卅时期还影响了所有的各种政治集团，有的渗入到各种政治组织，包括我党组织的农会、工会，尔后在工人运动中常起消极破坏作用。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工会都有帮会组织的人。因此，怎样教育这些人，把他们改造过来，脱离他们封建的尾巴，使他们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当时我们做工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五四时期湖南工人阶级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

我省新生的工人阶级在其自发斗争阶段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多出身于破产农民，不但带有小生产出身的痕迹，而且还受着手工业行会和地方帮派这些封建组织的严重影响，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托亲带故而由农民变为工人的。行会和帮派的组织，使工人群众的眼光局限于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觉悟的提高。只有到了一九一九年以后，本省的工人阶级与全国工人阶级一样，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五四时期，湖南工人的爱国斗争，既使工人阶级本身从自在阶级向自觉阶级逐渐转化，同时又促进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

工人阶级怎样走上政治舞台，这里首先要提到当时在爱国运动当中知识分子所起的先锋作用。他们注意到工人运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进步思想，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五四运动正是这样一个结合的过程。我们研究工运史就是要研究工人运动的规律，工人的罢工斗争首先是经济斗争，其规律是必然要发展到政治斗争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官僚资产阶级办的企业，买办阶级办的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办的企业，工人起来斗争就要跟他们发生根本利益的冲突，必然触及统治阶级，所以自发斗争到最后也是要遭到政府镇压的。由于自发斗争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提不出政治口号，不能把运动引向政治斗争，因此工人的自发斗争每每以经济斗争遭到政治的摧残压迫而结束。从五四运动来看，这个时期不同的一点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之前，一九一五年中国的《新青年》创刊后，也陆续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追求真理，要求民主与科学，要求变革社会，所以五四时期虽然党未建立，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所传播和灌输的革命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有很大影响的。毛主席在一九一七年就注意到工人运动，在一师办了工人夜校，随后又到各地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在长沙与一师的一些同学成立了新民学会，也是抱着追求救国真理、改造中国的目的。新民学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象蔡和森、陈昌、罗学瓚、李维汉后来都成为了我党领导人，当时新民学会在湖南起了很大作用，工人阶级通过新民学会对进步思想的传播开始接受各种先进思想，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了，所以说湖南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新民学会的成员发动的。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湖南人民奋起声援，举行五·七游行，遭到张敬尧的武装镇压，群众愤怒的火焰更加激昂，首先是长沙各校学生纷纷上街散发传单，并暗中进行组织工作。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邓中夏等到了湖南，与毛泽东同志商量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动员学生组织学生会。五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召开了两次学生代表会议，建立了湖南学联。六月三日，省学联举行长沙各校总罢课，发布罢课宣言，提出对政府的六项要求，接着开展各项爱国活动。在上海工人阶级是“六三”走上政治舞

台，湖南实际上在五月下旬筹备学联时就有工人参加来支持这个运动，当时湖南工人正式投入爱国斗争的首先是码头工人和店员工人，接着是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随着是印刷工人、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黑铅炼厂工人、钢元局工人及第一纱厂工人。他们的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呢？五四以后，省学联主要是以维持国货，抵制日货为中心开展各种爱国宣传活动，并效法北京各校组织救国十人团。十人团组织的起源是由于北京当时三千多学生被关押、军阀政府禁止游行，在校未被关的学生要支援被捕学生，去探望他们，给他们送粮送衣物以及搞声援活动等，只能少数人一组，不能成群结队，于是十人团发展成了当时爱国运动当中的一种小型组织，这种组织也在湖南发展起来。

六月二十八日，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工友张福田、罗克兴、蔡玉璋、杨柳春、周利生、岳保康、李松林、蒋明亮、刘紫云等组织十人团，发布宣言：“今者日本猖狂，占我青岛，夺我矿权，虐待我人民，要求迫胁，祸及肖墙，国将不国，吾愿我国人，同心协力，振起家帮，驱逐外毒，宁为中华堂堂鬼，莫作区区日本奴。兹我组织爱国十人团，誓永不购日货，庶免漏卮之万一。”接着，各校工友、店员工人、码头工人，均纷纷组织爱国十人团。到七月十四日，长沙的十人团已达四百多个，并组织了十人团联合会，柳直荀同志为副总干事。值得提出的是，十人团不仅当时在工人和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后来的工人运动中也起到了战斗组织的作用，造成了以后罢工斗争的一个特有的组织形式，是团结工人、组织工人的一个基层单位。这个组织我们很好的利用了，安源罢工就是采取十人团的形式，通过十代表、百代表、千代表、总代表来垂直领导、联络，消息传递起来很快，指挥也很灵便。水口山的几次罢工都组织了十人团，岳北农工会也是如此。当时刘东轩、谢怀德回到家乡就利用春节拜年之机串连组织十人团，岳北农工会的组织机构也是十代表、百代表、千代表组成，所以说十人团的组织在工人运动的前期是起到了战斗单位的作用的。这一点可说是取自于五四时期的经验。

自各行各业工人组织的爱国十人团参加之后，查禁日货的爱国运动当即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原来学联领导的各校十人团虽积极调查日货、维持国货，但奸商勾结日商洋行，偷运日货，倾销日货，各商店老板表面上都参加了国货维持会，实际是在维持日货，过去公开贩卖，现在改为暗地偷运盗卖，将日货的日本商标割换，贴上中国商标，拿仇货当国货卖，学生不熟悉商场日货情况，常为奸商欺骗，查禁日货的效果不大。当时，长沙市面的洋货业、苏广业（百货业）、绸布业仍以售日货居十之八九，国货十之一二。当学联与各商店店员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船舶工人联合起来查禁日货，抵制日货运动就得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六月二十五日，长沙各界举行抵制日货游行大会，参加者除各校学生外，还有模范劝工场，苏广同业会，萃华毛巾公司，印刷同业会等团体职工数千人，口号是：“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提倡国货，莫买日货。”这时，日商与中国奸商军警勾结偷运盗卖日货的行为都逃不脱工人的耳目。店员工人只要发现老板购进日货，便及时向国货维持会检举揭发，同时还以灌煤油和水的办法，使货物自行霉烂，又与学联暗中涂改明卖国货、暗卖日货的奸商招牌，大书“亡国奴，卖日货”于其上。搬运工人则明为店主搬运日货，暗地里担任了国货维持会的调查员、纠察队员，严密监视奸商偷运日货行为，与学联互通声气，故奸商所运之日货多被工人和学生所拿获。铁路工人和轮船工人更是一开始就拒运日本货，铁路工人停

运，停止装卸，这样一来禁止仇货就收到了实效。更为厉害的是店员工人和搬运工人等联合组织了“锄奸团”，这是当时对付奸商的一个比较激烈的措施，锄奸团意思就是铲除奸商，工人成立锄奸团后，奸商、买办立刻慌了手脚。锄奸团采用各种办法惩罚顽固的奸商、洋奴、日本浪人，打击了他们的猖狂活动，因而日货在长沙的行销，一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中间也是经过许多斗争的，店主看到自己的店员造反了，一是收买，二是威胁、解雇，码头上的把头则扣除工人工资，这中间又得到了学生的支持。这时，长沙的工人和学生每天都要拿获无数的日货，工人和学生为了更公开地给奸商一个严厉的惩罚，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行一次大示威，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在长沙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大会”，在教育会坪焚毁了大批日货，在焚毁日货中，工人、学生、职员和市民参加者近万人，无不拍手称快。经过焚毁日货示威游行以后，学生与工人联系更密切了。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一致对外，学联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于七月九日召开会议协商，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到会代表有苏广业、染织业、泥木行、轮船业、磁器业、纱业等三十多个行业，各校学生代表六十余人，上海派来联络的代表也参加了，自此湖南查禁日货的爱国运动更为普遍、深入地向着各地发展。

各县有工人参加的爱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衡阳一带，有湖南学联组织的讲演团赴各县宣传，鼓动了沿途的店员工会和码头工会、海员工会（那时凡在船舶上的工人都组织在海员工会里面）都起来组织十人团，担任检查日货的工作，各学校的炊事员出于爱国热忱也组织起来了，学生出外讲演他们就送去送饭，讲演团走到哪里他们就挑着伙食担子跟到哪里。

常德学生查禁日货，捣毁了几个洋行堆积的日货，洋行买办索赔五千银洋，常德店员工人即出来证明洋行买办的索赔纯属勒索，并协同当地驻军冯玉祥部查获了日本洋行偷贩鸦片，迫使日商关门逃之夭夭。

湘西辰沅道区二十余县纷纷组织十人团，以维持国货、抵制日货，将查获日货全部封存禁卖，各地搬运工人均积极协助，如辰洲轿夫不替日商抬轿。

醴陵各校于五月二十四日在北门天府庙举行提倡国货游行演说，游行时并惩罚奸商协生和洋货店，宣布其罪状，醴陵瓷厂工人参加了这次抵制日货的运动。

五四运动虽然是以学生为主力，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移到了工人阶级。湖南工人阶级一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就表现出极大的战斗力量，使当时查禁日货的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收到了很大效果。到十一月下旬长沙店员工人配合学生纠察队在火车站查获大批日货，要求立即焚毁，遭到奸商勾结军警夺走，引起工人和学生的愤怒，随即于十二月二日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游行，全市有店员工人、搬运工人、泥木工人、印刷工人、黑铅炼厂工人，二千多人参加，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则有八千多人参加，他们打着“民众联合！牺牲奋斗！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的旗帜示威游行，与张敬尧所派军警展开一场大搏斗，自此揭开湖南驱张的序幕。同时，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条件，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内爱国运动的兴起，工人阶级就迫切要求有自己的政党组织来指导战斗，工人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到工人中间去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湖南的工人运动也是一样，由自在向自觉转变，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开展以工人运动为主的革命斗争。

湖南劳工会与黄爱、庞人铨

谌小岑

湖南劳工会成立于1920年11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洗礼，由长沙青年工人组织起来的。

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原名黄正品，湖南常德人。“五四”运动中，是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热情投入了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于当年十月一日，偕同上海、山东、天津等处代表三十二人，为山东问题，到北京新华门请愿，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四十天。后被邀请为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觉悟社”社友，因在“新青年”上读了李大钊先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决心在学生运动后从事工人运动。

黄爱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设有机械、电工、化工、土木、纺织、印刷各科，毕业生分配在湖南当时新兴的轻重工业工厂工作。黄爱于1920年夏天，回到长沙后，联合甲工在各厂的同学，发起成立了这个湖南第一个纯正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

湖南劳工会在存在的一年多期间内，通过多次斗争，到1921年底，分别成立了纺织、机械、泥木、理发、码头、印刷、民船、刺绣等二十一个工团，登记的会员达九千余人。

湖南劳工会在组织上设评议会，由各工团各选评议员二人，讨论会务工作进行。又由评议会选出三个执行委员，黄爱为书记委员，王光辉为组织委员，庞人铨为教育委员，1921年秋，王光辉被推为出席第三国际东方民族会议代表，改选张剑白为组织委员。进行各项具体工作。

湖南劳工会刚一成立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是最后成为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那就是第一纱厂工潮。（即现在的安江纱厂）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轻工业有所发展，民间织布厂林立，唯缺乏纱线，要从上海等地买进。当局集资从英国买进一套拥有两千多锭子的纱厂设备，在长沙湘江对岸设厂，称为“湖南第一纱厂”。几年间，由于管理不善，加上技术力量差，年年亏本。

有几个狡猾的大地主、资本家，伺机成立了一个“华实公司”，用贿赂手段承租了这家纱厂。在经营中，对工人竭尽苛刻剥削之能事，引起工人不满，闹过几次风潮。1920年底，纱厂获利很厚，厂内负责人拟对职工中忠顺分子加以提升，并分给红利，企图分裂工人队伍，工人群众识破了厂方诡计，群起反对，厂内技工大部分为甲种工校毕业生，因在湖南劳工会支援下，成立了工会，举行罢工反抗。

1921年2月，厂方了解到湖南劳工会负责人是工潮的后台，因贿赂军警当局，将黄爱、王光辉等逮捕下狱。

长沙报界舆论，向有进步倾向。“五四”运动后，这种倾向更为显著，报纸上对于因